

知识考古学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谢强 马月 译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福柯作品

知识考古学

【法】米歇尔·福柯 著

谢强 马月 译 顾嘉琛 校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考古学/(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 -2 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 (2004.2
重印) (2007.4 重印)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1793-2

I. 知… II. ①福… ②谢… ③马… III. 思想史 -
研究方法 IV. B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884 号

书 名	知识考古学
作 者	[法]米歇尔·福柯
译 者	谢 强 马 月
校 对	顾嘉琛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3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62 千字
印 数	13,001-23,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引 言

第二章 话语的规律性

1 话语的单位·····	20
2 话语的形成·····	32
3 对象的形成·····	42
4 陈述方式的形成·····	54
5 概念的形成·····	60
6 策略的形成·····	68
7 意见与结论·····	76

第三章 陈述和档案

1 陈述的确定·····	84
2 陈述的功能·····	94
3 陈述的描述 ·····	116
4 稀少性、外在性、并合性 ·····	130
5 历史的先验知识和档案 ·····	140

第四章 考古学的描述

1 考古学和思想史 ·····	148
2 独特性与规律性 ·····	154

3	矛盾	165
4	比较的事实	173
5	变化与转换	183
6	科学与知识	197

第五章 结 束 语

第一章 引言

迄今,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对长时段予以了更多的关注,犹如他们从政治事件的变幻不定中和有关它们的插曲的背后揭示出一些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不可逆过程、不间断调节、一些持续了数百年后仍呈现起伏不定趋势的现象、积累的演变和缓慢的饱和以及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为了进行这样的分析,历史学家们拥有两种手段:一种是改造过的;另一种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商品流通的定量分析、人口发展和减退的剖析、气象及气候变化的研究、社会学常数的测定、技术调整及其传播和保持的描述等。这些方法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在历史范畴中辨别各种不同的沉积层。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已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透过这部动荡的由各届政府、无数次战争和饥饿写成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缓慢变动的历史,诸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

2 知识考古学

灌溉史、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那些传统分析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不相称的事件之间应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必然的关联?什么是贯穿这些事件的连续性或者什么是它们最终形成的整体意义?能否确定某种整体性或者只局限于重建某些连贯?)如今已经被另一类型的问题所替代,应当将什么样的层次相互区分开来?应该建立何种类型的序列?对这些序列中的每一个序列应采用什么样的历史分期标准?什么样的关系系统(等级、支配、重叠、单一决定、互为因果)是可以描述的?能建立什么样的序列中的序列?应在多长的时间范围内确定事件的各自不同的发展?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那些被称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它们的特殊性可暂时不管)的学科,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它们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在这些学科中,人们的注意力却已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今天,人们正力图在人类思想长期的连续性中,在某一精神或某一集体心理充分的和同质的体现中,在某一竭力使自己存在下来、并且在一开始即至善至美的科学的顽强应变中,在某种类型、某种形式、某项学科、某项理论活动的持久性中,探测中断的偶然性。这些中断的地位和性质多种多样。巴什拉*曾这样描述过“认识论的条条框框与界线”:它们推迟了各种认识的不确定并合,打破了这些认识的缓慢的成熟过程,迫使它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把这些认识从它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

* 巴什拉(1884—1962年),法国哲学家。(全书注释除特别标明外,均为译者注。)

始的动机中截取下来,把它们从它们的虚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因而它们在历史分析中就不再意味着追寻静默的起始,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测定合理性的新形式以及它的各种不同的效果。冈奎莱姆* 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可以成为分析的模式,他的分析说明,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冈奎莱姆还对科学史的微观范畴和宏观范畴作了区分。在上述两个范畴中,事件及其后果不是按照同一方式安排的:因此,一个发现、一种方法的制订,乃至一位学者的研究和失败并不具有同样的偶然性,而且也不可能在它们各自的层次上被用同一种方式描述出来,因为它们无论在哪一点上,被讲述的并不是同样的故事。只有像历史这样的科学,才具有循环往复的再分配。随着历史的出场而变化,这种再分配呈现多种过去、多种连贯形式、多种重要性、多种确定的网络以及多种目的论:以至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塞尔(Serres)在数学领域中刚刚提出了这种现象的理论。〕正像盖罗特(Guérout)对系统的构造单位所分析的那样:把影响、传统、文化连续性作为描述的单位是不妥当的,而内部一致性的、合理性的、演绎链和并存性的描述才是合理的单位。总之,最彻底的断裂,毋庸置疑,是那些由理论转换的研究实现的割裂,即在这种理论转换的研究“使科学脱离它过

* 冈奎莱姆(1904—1995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

4 知识考古学

去的意识形态并用这种把过去作为意识形态来表现的方法建立某种科学”^①之时。除此之外,当然还应该补充一点: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

因此,如此历史分析将要面临的——正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就不再是弄清连续性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立起来的;某种惟一的,同样的意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并对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构成一种独一无二前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回收、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的。这不再是传统和印迹的问题,而是分割和限界的问题;不再是基础遭到破坏的问题,而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的转换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展开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历史的这种新形式正是要试图通过这些问题制订它自己的理论:如何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种不同的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换)?以什么样的标准区分这些我们涉及的单位: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作品?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本文?怎样使我们可以涉身的层次多样化?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断裂和自己的分析形式:什么是形式化的合理的层次?什么是解释的层次?什么是结构分析的层次?什么是因果性的确定层次?

①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68页。——作者注

总而言之,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

* * *

但愿这种交错倒置不至引起错觉。我们不能只凭表面现象就想像一些历史学科是从连续过渡到不连续,而另一些则是从不连续的密集变为不间断的一致性的一统天下;不能以为在政治、制度或者经济的分析中,人们对整体的确定越来越敏感,而在思想和知识的分析中,却越来越关注差异问题;不能认为这两种重要的描述形式相互交叉起来却又互不相识。

其实,这些与前面提到的问题是同一性质的,只是在表面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对文献资料提出质疑。请别误解:显而易见,自从历史这样的学科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文献了。人们查询文献资料,也依据它们自问,人们不仅想了解它们所要叙述的事情,也想了解它们讲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了解它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说,了解这些文献是说真话还是打诳语,是材料丰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然而,上述这些问题中的每个问题,以及这种对考证强烈的批判性的担忧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在这些文献所叙述的事情的基础上——有时是只言片语——重建这曾经是文献的来源,而今天却远远地消失在文献背后的过去。文献过去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的印迹虽已微乎其微,但还是有幸可以辨认出来的。然而,历史通过某种并非始于今日,但显然尚未完成的变化改变了它相对于

6 知识考古学

文献的位置。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序列和某些关联。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构成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自身也许享有充分记忆优势的历史来说,文献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就一个社会而言,历史是众多的文献获得地位和确立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和文献不能分离的。

简而言之,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印迹的地方,在人们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曾经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曾经有段时期,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

迹、无生气的印迹、无前后关联之物和过去遗留之物的学科，与历史十分相似，它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妨作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趋向于考古学——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

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首先是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表层效果：在观念史中的断裂的增加和在确切意义上所说的历史中出现的长时段。事实上，后者就其传统形式而言，旨在确定事实之间或者过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关系、循环确定关系、对立关系、表达关系）：序列已经建立，就得确定各个因素之间的邻界。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序列：确定每一序列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线，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更多的是描述不同序列之间的关系，以便建立序列中的序列或是某些“范围”：由此产生了层次的增加、层次的脱节、时间的特殊性和这些层次特有年代的特殊性；由此产生了不仅要区分重要事件（及其一连串后果）和那些无足轻重事件的必要性，而且要区分属于截然不同的层次的事件类型的必要性（哪些是瞬间的，哪些是中等时间的，例如技术传播或货币减少；哪些是属于慢节奏的，如人口的平衡，或者逐步调整经济以适应气候变化）；由此产生了使罕见的或者重复事件构成的粗测系统出现的可能性。当代历史中长时段的出现不意味着向历史哲学、世界的洪荒时代或者向由各种文明的命运所规定的那些阶段的回归，它的出现是在方法论上慎重制订序列的结果。不过，在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中，同样的变化却引起了相反的结果：这种变化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或者人类思想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序列，它对聚合和完成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对整体化的可能性

8 知识考古学

提出了质疑。这种变化还导致了对不同的序列的个体化,这些序列或并列,或前后相连,或交替,或相互交错,而不可能把它们简化为线型模式。这样,在这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这部人们总是追根溯源直至开天辟地的编年学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些有时是短暂的,互不相同的,背离独一无二的规律的阶段,它们经常负载着各自特有的历史类型,这些类型不能还原为正在获得、进化和回忆的意识的普遍模式。

第二个后果是: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就古典形式的历史而言,不连续既是已知的,又是不可想像的:那些以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和那些通过分析,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它在历史分析中身兼三种职能:首先它构成历史学家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历史学家勉强从他所要研究的材料中接受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应该,至少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假设,区分分析的可能的层次,适用于每一层次的方法,以及适合所有层次的历史分期。不连续性还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分析要删除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要发现的东西正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条曲线的转折点,某种调节运动的倒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一循环因果性不规则的瞬间。不连续性最后是研究工作不断进行阐明的概念(而不是在两个肯定形态之间把它当作一致的无差别的空白而被忽略)。根据人们对它指定的范围和层次,不连续性具有特殊的形式和功能:因为当我们在描述认识论的

界限、人口曲线的逆转，或者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时，我们所言及的不是同样的不连续性。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因为它可以使各种领域个体化，而人们却只能在它们的对比中建立这种不连续性。总之，因为它可能不仅是出现在历史学家话语中的概念，而是历史学家们私下假设的概念。事实上，断裂作为对象向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亦即它自身的历史——如果不以这种断裂为起点，历史学家还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种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从障碍到实践中；介入到历史学家的话语中，它在这一话语中不再充当应该抑制的外界必然性的角色，而是起着人们使用的行动概念的作用；并且借助于由此产生的符号的倒置，它不再是阅读历史作品中的消极面（历史的反面、它的失败、它的能力的局限），而是成为积极因素。这个积极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对象，并使得对它的分析更为有效。

第三个后果是：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这样的计划与下面的两个或三个假设密切相关，假设在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因果关系网络，——它可以将这些现象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派生出来，类比关联，——它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互

为象征的,或者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的。其次,假设历史性惟一的同一形式包含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性、心理情性、技术习惯、政治行为,并把它们全部置于同一类型的转换中。最后,假设历史本身可以被一些大单位连接起来——阶段或时期,——这些大单位在自身把握着它们的内聚力的原则。这些假设正是新历史在判断系统、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时所提出疑问之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力图获得各种并行的和相互独立的历史的多样性,如:经济史的多样性与制度史的多样性相比,制度史的多样性与科学史的、宗教史的或者文学史的多样性相比。这也不是历史仅仅力图在这些不同的历史中,指出某些日期的巧合,或者某些形式和意义的类似。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总体历史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形式可以在这些不同的序列之间得到合乎情理的描述;这些序列能形成什么样的垂直系统;这些序列之间的关联和支配关系是怎样的;差距,不同的时间性和多种记忆暂留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在哪些不同的整体中,一些成分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序列,还要确定什么样的“序列中的序列”,——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①有可能被建立起来。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

① 是否应该对最后的闲逛者强调:一个“范围”(无疑是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讲),形式上就是一种“序列中的序列”?无论如何,这全然不是人们为消除孩子们的失望而置于幻灯前的一幅小的固定图画,而在孩子们的年龄,他们当然更喜欢电影的生动。——作者注

最后谈谈第四个后果：新历史面临着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无疑有一些在新历史出现的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今这一类问题却成为新历史的标志。我们可以举出其中的几例：文献的一致和同质的资料体的构成（开放的或封闭的，有限的或无限的资料体）；选择原则的建立（根据人们需要彻底研究的大量文献，依据统计学取样的方法进行选材或者试图提前确定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成分等要求）；对分析层次和适合分析层次的成分的确定（在被研究的材料中，人们可以提出数字的指标；某些有关事件、机构、实践的——清晰的或暗含的——参照；被使用的词及其使用规则和这词的语义场，或者还有句子的形式结构和连接它们的连贯类型）；对某种分析方法的说明（对材料作数量处理，根据某些可确定特征进行分解，人们正在研究这些特征的关联关系，解释性剖析，对重复性和分配的分析）；对于那些联结研究材料的整体和子整体的确定（区域、时期、单一过程）；对于那些可以标志某一整体的关系的确定（它们可以是数字的、逻辑的关系，也可以是功能的、因果的、类比的关系，还可以是从能指到所指的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是属于历史方法论范畴。这个范畴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人们看到它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前不久构成历史哲学的东西，和历史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如：关于变化的合理性和目的论，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关于在过去的情形中和在现在的未完成的整体性中发现和构造某种意义的可能性）。其次因为它在它的某些点上重新分割已在其他领域发现的问题——如在语言学、人种学、经济学、文学分析、神话等领域中。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完全可以赋予这些问题以结构主义这个缩略词。然